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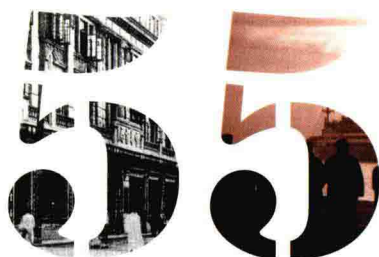


上海观察◎编

钩沉

4855

申喉



上海三联书店

申 喉 4855 钩 沉 上海观察◎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申喉 4855 · 钩沉/上海观察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2

ISBN 978-7-5426-5456-4

I. ①申… II. ①上…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近现代
IV. ①K29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1350 号

申喉 4855 · 钩沉

编 者 / 上海观察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冯 静

装帧设计 / 张志凯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456-4/K·361

定 价 / 4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48 目 录 55

- 晚清内陆青年与上海 十年砍柴_1
- 1952年曹杨新村,结局或开始 王海_4
- 马斯南路,四个寂寥的男人 王海_9
- 1950年财富细节:女星购公债 王海_13
- 宝庆路3号往事 依时_17
- “豹纹火警哥”的十月八日 王海_20
- 解放初的禁娼运动 寿小南_25
- 不合时宜的讪笑 依时_29
- 胸佩大红花的日子 依时_34
- 1952:“跑马厅”的消失 王海_40
- 邬志远,跑马厅最后的骑师 王海_44
- 上海建筑的“文革”记忆 读史老张_51
- “麦根”的迷宫 王海_56
- “文革”中的上海文人群像读史 老张_60
- 大上海计划:被遗弃的旧梦 许云倩_64
- 江湾体育场,健儿今何在? 许云倩_70
- 一张报纸的65年:梦始之地 章迪思_77
- 1952:南京路的“叮当梦” 王海_83
- 叶家花园:一个移民的传说 许云倩_89
- 甲午战争中的上海媒体 陈事美_93
- 陆阿狗和他的同学们 王海_97
- 1951:梧桐细雨淮海路 王海_103
- 复兴岛:黄浦江上有个岛 许云倩_107
- 大自鸣钟:文青忘不了的淘碟圣地 陈意心_112
- 《一步之遥》与阎瑞生案 秦凌_116
- 上海“差头”的百年风云 秦凌_120
- 上海人心目中的英雄菜:红烧肉 刀哥_124
- 1955,开往洛阳的夜车 王海_128

豆浆的乡愁及甜咸之争 秦凌_132
父亲张乐平的杯酒人生 张慰军_135
福州路淘书往事 陆其国_142
重访鲁迅的上海美食地图 蒋俭_147
1952,穿香云纱的奚翠珍 王海_154
巴拿马与茅台酒说不清的恩怨 秦凌_161
金陵东路:另一种“大马路”的存在 章迪思_166
浦东旧照:最不像“上海”的上海 章迪思_169
龙华庙会:上海的民间乡愁 王小路_175
申报馆:重回摩登时代 章迪思_181
沪西工人俱乐部:工人的全盛时代 露文_187
徐汇旧照:老派文青的生活样本 秦凌_192
普陀旧照:武宁路天桥见证的荣光 子不语_196
黄浦旧照:紫金路的平民生活记忆 顾士强_199
八埭头:我的家族记忆起点 许云倩_208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上海往事 秦凌_217
海上杂谈:上海人中谁是“本地人” 小岛_221
64年前逼死老婆的男人们 依时_224
上海人的大闸蟹情结始于何时 秦凌_229
沪版“猪笼城寨”里的真实人生龚汉 岚孔亮_233
八十年代上海青年如何脱单 依时_238
言慧珠在“华园”的爱与死 蒋俭_243
谜一样的哈同花园读史 老张_249

晚清内陆青年与上海 | 十年砍柴

清末至 20 世纪中叶，中国几乎所有政治、经济、文化重要人物，要么在上海度过一段重要时光，要么影响其一生的转折点发生在上海。上海不仅成为内陆青年眼中的财富之都和时尚之都，也是文化教育之都，南洋公学、商务印书馆、《申报》等文教机构对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青年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岁在己亥。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段阴云密布的日子，一位年逾五旬的老人在故乡——广东梅州，写下了一首怀人诗：

谬种千年《兔园册》，
此中埋没几英豪。
国方年少吾将老，
青眼高歌望尔曹。

诗的作者是后世称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他所思念的不是同辈名人或显宦，而是三位年龄小其三旬左右的少年。他在自注中言所怀之人乃“李炳寰、蔡良寅、唐才质”。三人皆为湖南籍。其中李炳寰是慈利县人，年最长，1876 年生人；唐才质为浏阳县人，1880 年生人；蔡良寅乃邵阳县人，1882 年生人，年最少，他后来改名蔡锷。

这三位湘籍学生是公度先生在长沙时务学堂非常器重的学生。写这首诗时，黄遵宪正值劫后余生，心有余悸。黄遵宪和他几位学生的命运都与上一年失败的

维新运动有关。而黄遵宪能九死一生,留得一条命回到故乡,只因事变发生时他恰好

好在上海。

黄遵宪作为出使过日、英、美,东南亚地区各图的资深外交官,深知西方国家和日本之所以强大,乃是因为国家政治制度比大清朝先进得多,因此一直主张变法。当朝廷开始变法时,他也受到了重用。1897年夏,他被任命为长宝盐法道(主管湖南长沙府宝庆府的食盐、钱粮、刑名),是正四品的高官。等他到达长沙后,恰好湘省按察使出缺,他便被任命为署理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刑事、民事、治安和官吏监督,相当于今天的省政法委书记兼纪委书记。此时,湖南巡抚乃是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在这位开明巡抚的倡导下,闭塞的湖南一跃和北京、上海并列为变法三大中心之一。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兴办了时务学堂;也是在黄遵宪的推荐下,学堂聘请了梁启超为学堂总教习。黄遵宪作为一位高官,亲自赴学堂为学生讲课,他和学堂其他教师或管理者如陈宝箴公子陈三立、同样是贵公子的谭嗣同、翰林熊希龄结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本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后,也下旨调黄遵宪进京重用。怎知黄在长沙水土不服得了疟疾,因病推迟行程。正好当时上海《时务报》奉旨改为官办,原来的老板汪穉卿以补偿不到位等理由迟迟不肯交割。于是朝廷命黄遵宪途经上海,查办这事,秉公核议。于是,黄遵宪于1898年阴历七月初八离开长沙,抵达上海时已是七月三十日。

差事还没开始办,京城传来惊天霹雳,9月21日(阴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大捕新党,康、梁潜逃。9月28日(阴历八月十三),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守旧势力对维新人士进行疯狂打击,黄遵宪自然不例外。御史黄均隆奏称黄遵宪早在湖南就与康梁等人暗通消息。而且坊间传言康有为隐匿在黄遵宪的寓所—康实际上藏在日本使馆,而黄遵宪多年驻日,与日本政界关系很好,故有此讹传。于是,朝廷下旨两江总督派员将黄遵宪抓捕归案。

黄遵宪在上海住在道公所,听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后,警觉的他立刻迁入洋务局。因为洋务局毗邻租界,便于向洋人传递消息。果然,上海道蔡和甫派兵围住黄遵宪的寓所,要带走黄遵宪。而此时,日本的前首相、和黄遵宪颇有交情的伊藤博文正好在上海,他立刻去电北京,让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交

涉,称未公布黄遵宪之罪就拘捕他将有碍两国邦交。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则当面找到正在上海的四川总督奎俊,说若对黄遵宪处理不公,英国政府必将干预。

清廷最怕的是洋人,这次是英、日一老牌帝国一新晋强国一起出面营救黄遵宪,清廷不敢蛮干。当时的两江总督乃湘军名将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他本来就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样思想开明,一看这势头,立马上书朝廷,奏请将黄遵宪从轻发落。即使其有应治之罪,也得将其遣送回原籍,查明具体罪状后再办。朝廷批准了刘坤一的奏请,于是黄遵宪便被免除一切职务,回到了故乡广东梅州。

几乎在黄遵宪离开上海回故乡时,蔡锷、唐才质等高足来到了上海。变法失败,新党的大本营时务学堂自然停办。失学的原时务学堂学生蔡锷、唐才质、范源濂先去武昌的两湖书院,想插班求学,两湖书院一看是时务学堂的学生,立马拒绝。于是少年们只得买舟东下,来到上海,投考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举目无亲的蔡锷等人幸亏遇到了原来在时务学堂当外语教师的李维格,他早就被挖到南洋公学。在老师的引荐下,1899年夏,这三位湖湘子弟考进了南洋公学,而李炳寰则直接去了日本。

蔡锷等人在南洋公学求学的日子很短,但上海是其人生重要的驿站。蔡锷等人在公学读了不到半年,和先期逃亡到日本的老师梁启超接上头。经梁启超一鼓动,几位买了船票,坐船从上海去了日本(那时候,清国臣民到日本等国是免签的,路费比走陆路去北京还便宜,日本东京的生活费也不比上海昂贵)。

黄遵宪寄予厚望的三位学生都有成就。其中最可惜的是李炳寰,1900年回到上海,再潜入湖南,参加唐才常(即唐才质的兄长)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兵败被杀。蔡锷此次也一同回国,但因为被指派外出联络,未参与暴动,侥幸存活。后领导护国运动推翻了袁世凯所复辟的帝制,因患病赴日医治,不治身亡,其灵柩亦是上海靠岸,回到故土。唐才质活得最长,熬过了多少血雨腥风,在1966年12月逝于长沙。

上海,是蔡锷等湖湘子弟命运的拐点。蔡锷这代内陆青年精英,其人生轨迹已经从传统的北上京师参加科举求官,变为东下上海追求更新更宏大的前程。这种变,亦可映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之大变。

本文发表于2013年12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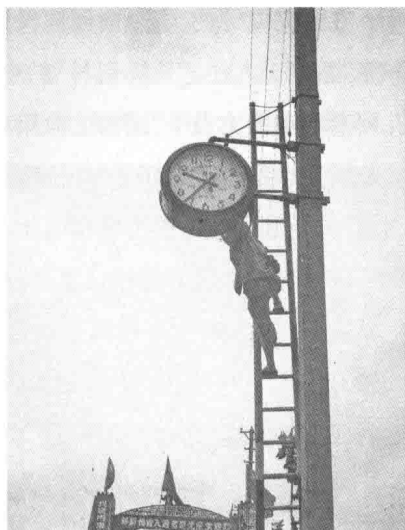


1952 年曹杨新村, 结局或开始 | 王海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 厚重的历史记忆愈发显得弥足珍贵。日前,《解放日报》挖掘整理出一批自 1949 年以来、由一代代新闻记者拍摄的珍贵历史照片, 其中大部分, 从未向世人公开过。从现在起, 我们将和读者诸君一道, 轻拾起一张张泛黄的照片, 细细品味那些光影瞬间背后的故事。

1952, 记者很忙。

这一年的6月25日, 新中国第一家工人新村——上海曹杨新村大门处的电钟正在安装。《解放日报》摄影记者俞创硕站在安装扶梯的约十米处, 仰拍留下了影像。这并非俞创硕第一次来曹杨新村。之前的一天, 如果我记忆的坐标没有出错, 在曹杨一村后来那座非常著名的、横跨曹杨环浜的“红桥”上, 一对夫妻依桥而立, 脉脉凝望的镜头永久地留在了他120相机的胶片上。画面上, 两人都露出洁白的牙齿, 妻子看上去比丈夫更显得健硕——她更像《良友》画报的某期封面女郎而并非“勤生纱厂女工孔阿菊”——是的, 目前我能看到的关于那组照片的说明的确这么写着。



新装在曹杨新村大门口的电钟。
(俞创硕摄 1952年6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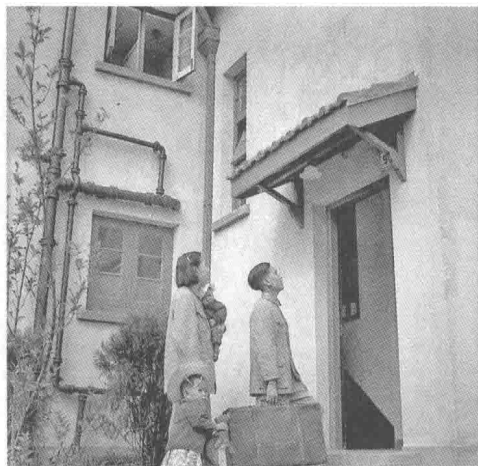
徐真华和孔阿菊。(俞创硕摄 1952年6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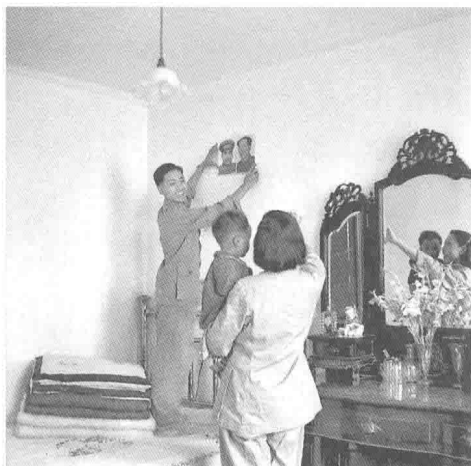
休假日徐真华和孔阿菊骑了自行车一块儿去看电影。(俞创硕摄 1952年7月1日)

在拍完电钟的次日，俞创硕又来到了曹杨新村，在村口的某个制高点上，留下一张“新建工人住宅曹杨新村”的中远景。四天后的7月1日，俞创硕再次找到了孔阿菊和她的丈夫——“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徐真华，或许之前的照片不那么让他满意。拍摄地点还是“红桥”——不看留下的文字资料，你会误认为和之前“脉脉相望”的是同一天。夫妻俩洋气十足的装束未变，不同的是道具增加，自行车从一辆变成两辆。和之前摆拍痕迹稍浓的那张比，夫妻骑车的照片，多了一丝灵逸。

就此，在徐真华与孔阿菊的故事里，俞创硕暂时退场。不过仅仅隔了一天，1952年7月3日，俞的同事汪刚再次找到了这对已然十分具备镜头感的夫妻。汪刚的任务显然是“让时光倒转”。在他留下的两幅照片上，第一张的图说为“徐真华和孔阿菊搬进了曹杨新村”，照片上孔阿菊左手抱一个孩子，右手牵一个，手上的已经酣然入睡。徐真华右手提一只皮箱，左脚正踏在楼房进单元门的台阶上。和之前身穿“洋服”在红桥留影不同，夫妻俩这次穿的都是略显皱巴巴的解放服。第二张的图说为“徐真华和孔阿菊搬进了曹杨新村，他们愉快地布置着新房”。



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徐真华和勤生纱厂的孔阿菊搬进了曹杨新村。(汪刚摄 1952年7月3日)



徐真华和孔阿菊搬进了曹杨新村，他们愉快地布置着新房。(汪刚摄 1952年7月3日)

当然这也不是汪刚第一次进曹杨新村拍摄。就在俞创硕第二次找到徐真华、孔阿菊补拍镜头的那天，汪刚也在。时间应该比“看电影”的稍晚，“国营上海第二纺织

机械厂陆阿狗与黄梅狗等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就在草地上下棋”。照片正中摇着蒲扇的还是徐真华,十分抢镜。他的右边,膝上坐着一名胖孩子的人应该是陆阿狗,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我上世纪 90 年代中采访过陆老,当时他已不住在曹杨新村)。



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陆阿狗与黄梅狗等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就在草地上下棋。(汪刚摄 1952 年 7 月 1 日)

至此,本组照片的时间线基本厘清。俞创硕、汪刚这对同事如此钟情同一个题材的原因不难理解。作为新中国样板式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一村)无论在建筑史还是城市史上留下可堪论争的话题都不可谓不丰富。和之后建造的曹杨二村—N 村以及之后上海大规模上马的甘泉、宜川、同泰、顺义、石泉、金沙、普陀等仅仅为了解决住房而在建筑上乏善可陈的工人新村相比,红瓦白墙、每公顷的密度仅为 278 人的曹杨一村,是开始,也是结局。

曹杨一村的设计者汪定曾 1935 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8 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筑硕士学位,1939 年回国。建国后,曾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

局长兼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主持、指导了上海体育馆和上海宾馆等工程的设计。他还参与了延安中路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50 米大跨度拱形屋盖的设计。

汪定曾设计的曹杨新村，既有上海旧时弄堂的情趣，又不乏欧美社区的影子。1929 年美国科拉伦斯·佩里创建了“邻里单元”理论，要求在较大范围内统一规划居住区，使每一个“邻里单元”成为组成居住的“细胞”，并把居住区的安静、朝向、卫生和安全置于重要位置。在邻里单元内设置小学和一些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公共建筑及设施，并以此控制和推算邻里单位的人口及用地规模。

回溯曹杨新村建成之后的种种，与“邻里单元”理论显然暗合。在新村落成的同时，新村的第一家商店——曹杨商场的前身曹杨新村商店也正式挂牌营业。此外还开设了菜场、老虎灶、浴室、公共卫生间等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设施。居民入住两个月后，新村的幼儿园——即现在的上海市实验幼儿园，新村小学——即现曹杨中心小学都很快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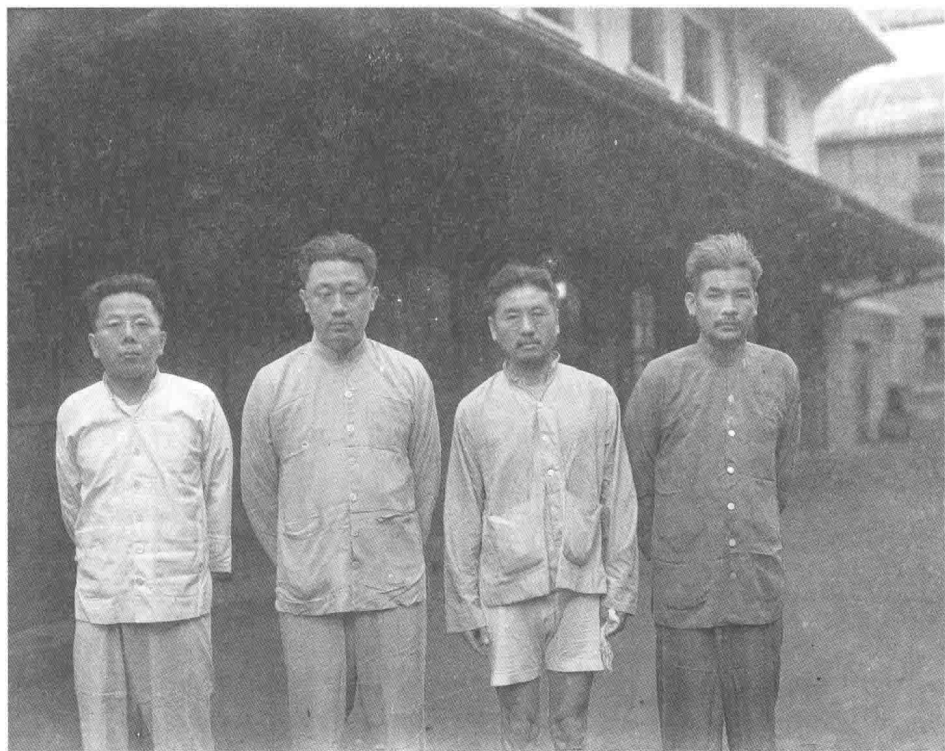
汪定曾据说后来受到了批评。我猜是因为“过于奢侈和理想化”的设计。这让曹杨一村成为整个“曹杨系”乃至整个“工人新村”矩阵里的异数。当然，这也是 2005 年曹杨一村跻身上海历史保护建筑的主因。1952 年 5 月曹杨一村竣工后，那里的建筑曾被称为“苏式洋房”，其实汪定曾致敬的对象无疑更靠近科拉伦斯·佩里，只是彼时不可言说而已。

一个牛人设计了一个曾经很牛的村落，这是上边的故事。最后说点边角料的牛事——摄影者俞创硕。被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的俞创硕拍摄过 1938 年 11 月的长沙大火、第三战区反攻南昌的战役、重庆校场口隧道大惨案；1945 年，抗战胜利后，俞创硕回重庆采访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和谈小组以及董必武、叶剑英等讨论组成联合政府的活动……朱总司令那张广为人知的《良友》画报封面照，正是出自俞创硕的镜头。

1949 年之后，俞创硕任《解放日报》摄影记者。拍摄曹杨新村包括之前新时代来临之后的种种，于他是某种结局，更是开始。

（图片来源：《解放日报》老照片）

本文发表于 2013 年 12 月 14 日



马斯南路,四个寂寥的男人 | 王海

【《解放日报》独家老照片】对于这张照片,我能找到的所有文字资料只有短短一行字:1949年6月10日,证券大楼巨钞案首批判决犯。

四个极具民国范儿的中年男子透过电脑屏幕，漠然地看着我——也看着当年摄影者 120 相机的镜头——准确地说，不怵于目光直视的其实是三个人，另外一个微胖界男子，略显怯意地眼帘低垂。说“民国范儿”多少有点扯，这哥四个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对于这张照片，我能找到的所有文字资料只有短短一行字：1949 年 6 月 10 日，证券大楼巨钞案首批判决犯。

这天上海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大事——军管会取缔上海证券大楼以及有价证券和黄金白银交易，平抑城市物价。这场保卫新政权经济话事权的战斗发生距上海解放不到 20 天。人民币于当年 6 月初发行后，受到投机者狙击，造成物价飞涨，人民币只能用于小额流通而无法完成大宗商业交易。上海市委先后在 6 月 5 日、6 日两天总共向市场抛售了 41 万枚银元，希望借此能够弥平银元上涨的压力，但这批银元却很快被上海市场所吸收，仅仅起到了延缓升值速度的效果。这是促使强硬力量几天后介入的主要动因。

64 年后，当我在上海图书馆里小心翼翼地翻阅 1949 年 6 月份《解放日报》合订本（天晓得他们居然从库房调出原件给我）时，不禁对当天束手就擒的那批投机者的政治敏感性“深表叹服”。1949 年 6 月 5 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者赶快觉悟！》；次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上海人民纷纷要求严格取缔银元市场，稳定物价安定民生》；又过了一日，《市民痛恨银元投机，要求政府严肃处理》；6 月 8 日，《银元投机威胁上海人民生活，各界一致主张严惩》；正式动手的前一天，《全市人民愤怒万分，银元投机不能再忍》……听锣听音，话说到这个份上，6 月 10 日这天依旧前赴后继进入“投机中枢”证券大楼的投机者可谓“要钱不要命”的熨帖代言。或许，金钱真的能使人疯狂。

参与战斗的几百名军方人士多数事前不知缘由，行动前每人收到一只布袋，要求掏空兜内的所有东西，将写有名字的字条投入后，上缴部队。前往证券大楼途中，行动者被告知具体目的地，同时一条极为严厉的指令被传达：遭遇现场顽强抵抗的，可就地正法。

整个行动从上午十时持续到午夜，主要时间均用来清点收缴之财物，计有：黄金 3642 两、银元 39747 枚，美元 62769 元，港元 1304 元，人民币 1545 多万元和囤积的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商品以及手枪 2 支。在一名资深证券经纪人处，军方起

获了黄金 17 斤。参与战斗者每人获得一元钱以及一斤肉票的奖励,此外,所有参与者还获得了一项特别奖励:允许打开收缴财物的箱子,一饱眼福。

事后彻底搜查证券大楼,发现不少桌子的垫脚物是白花花的银洋,在一些房间的隔层中搜出大量美钞。大楼被政府分给部队居住后,有战士更在地板内起获数量超过百根的金条。证券大楼里这些真真假假的财富段子,在日后的岁月里长久地在民间加工、发酵、传播。

今天大家看到的这四个人,应该是当天行动最终落网的且被法律判决 238 人中的 4 名。1949 年 6 月 13 日的《解放日报》报道《银元投机嫌疑犯,昨已解地方法院二三八名均将受审》。从四人站立的背景看,极似 1990 年代中期我经常前去采访的杨浦区平凉路 2049 号杨浦分局(解放前的杨树浦巡捕房)那种标准的巡捕房格局:回字形楼房,中间院落四方、宽敞。如果我的判断没有出错,照片的拍摄地点应该就在当时地方法院第一看守所,地址马斯南路,即今天的思南路 99 号(现为市公安局 99 号大院)内,拍摄时间应在 13 日前后。

史料记载,事件中被扣的投机倒把者,首恶分子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但出于经济惩戒的目的,他们被允许以金钱抵扣刑期。

取缔证券大楼的战斗起到了确立人民币作为主导货币的目的。但证券交易这个东西,一直要到 42 年后 1991 年的 11 月 26 日,方重新在昔日的远东第一大城市出现。

有意思的是,相隔 42 年的和证券交易有关的“收”与“放”,都与一个人有关:邓小平。

据相关人士回忆,邓小平当时准备与刘伯承率军挥师西南,受陈毅邀请,参加行动联席会议。会上,邓小平第一个发言表示,“上海现在这种局面,与证券大楼捣蛋是分不开的,治标治本,既然要打击不法分子,打蛇打七寸,取缔证券大楼我赞成。(《人民政协报》2009 年 12 月 11 日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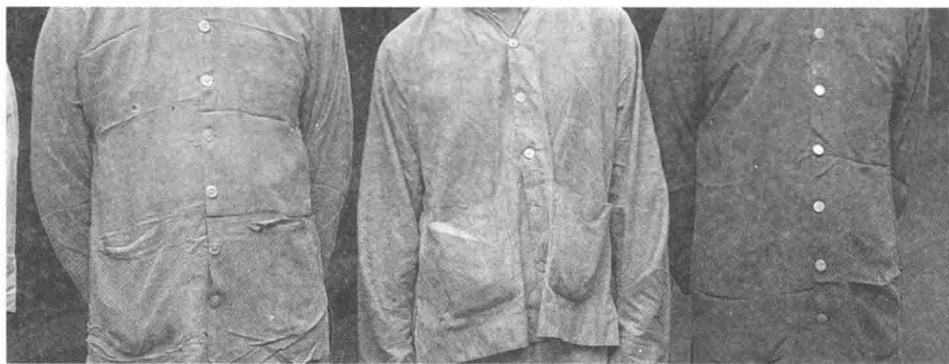
而据新中国上海证交所成立的推手、上海当时的领导朱镕基事后回忆,在决定要筹建上海证交所之前,他就曾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过。他说:小平同志,我们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邓小平当时说:好哇,你们干嘛。

上海证券大楼所在与当年的解放日报社仅一箭之遥:汉口路 422 号。前几天我经过汉口路时特意张了一眼。如今这座楼的房客是:五金机械公司、交家电集团建

筑经营部、快递公司、售楼处、一家医保中心，还有如过江之鲫的贸易、科技公司……

如今 50 岁左右的上海人或许还记得一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证券大楼的战斗》，描绘的正是这段史实。小人书里的银牛（银元贩子）无不横肉狰狞、獠头鼠目。但在今天的黑白照片上，我能看到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人。

64 年前 6 月的某一天，上海火热的夏季还未到来，气候应该十分惬意。四个男人站在马斯南路 99 号的院子里，神情寂寥地面对摄影记者的相机。令我有点小纳闷的是，这哥四个身上的衣服，都带有明显的折痕，一般这是折叠许久的道具服装甫上身才会出现的 bug。真实的现场拍摄图景永不可能还原了。但这又有什么所谓呢，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谁能考据明白一粒尘埃的前世今生？



金融犯衣服细节

（图片来源：《解放日报》老照片）

本文发表于 2013 年 12 月 21 日